

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农村社区的语言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力加村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

The Language Life in a Tibetan Village Community with Globalization: Case Study on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 in Lijia Village, Huangnan, Qinhai

姚春林*

yao_chunlin@126.com

Yao Chunlin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唐山 河北 中国, 063009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ngshan, Hebei, China 063009

采用问卷调查、辅以访谈的方式，调查藏语安多方言区的一个农业社区（力加村）的语言生活、语言活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结果显示，当地藏语文活力旺盛，藏语是当地各种场合的主要交际用语。被调查对象中近一半人是藏汉双语人，他们大多年龄较小或受过教育。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文字态度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对藏汉语文都持积极态度。所有被调查对象都希望后代接受藏语教育，近一半被调查对象希望后代在接受藏语教育的同时接受汉语

In order to study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in a Tibetan agriculture community (Lijia Village) in Amdo dialect reg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are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ibetan Language which is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local area is full of vitalities. All subjects hope their children access Tibetan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half of the subjects hope their children access Chinese or (and) English education and become

*[作者简介] 姚春林，博士，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濒危语言学、复兴语言学、语言习得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语言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BJ2014081）、第 53 批博士后面资助项目“中外语言保护典型案例研究”（2013M530825）和国家民委科研项目“澳大利亚原住民语文政策研究：兼论对我国民族语文保护的启示”（2015-GM-065）的部分成果。

和(或)英语教育。被调查对象对藏语具有很强的民族情感。他们承认藏语文在当地活力旺盛,但仍旧担心“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行不到位”会影响当地的藏语文发展。

[关键词] 藏族农区; 语言生活; 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

bilingualism.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half of the subjects are Chinese-Tibetan bilingualism, who are young and (or) educated; and most of the subjects hold th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Key words: Tibetan Agriculture Community;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今世界正逐渐转变为“地球村”。经济、社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人员流动,同时增加了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世界上越来越难找到一种在封闭状态下独立发展的语言,各种语言变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上互相竞争,以求得生存空间。这种发展态势客观上加快了语言同化和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近些年世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可以用“人口爆炸”来形容。与之对应,世界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尤其近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总是伴随着语言文化的消亡。据语言学家估算,两千多年前世界上约有15万种语言(Lewis, 2009),到目前只剩下7106种(Lewis, Gary & Charles, 2014);在仍被使用的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九种语言被全世界49.7%的人口作为第一语言习得;与这些强势语言对比,1537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千人,3515种语言的使用人口不足万人(Lewis, Gary & Charles, 2014)。也就是说,目前世界语言的发展呈分化趋势。强势语言的使用人口越来越多;弱势语言的使用人口在不断流失。部分语言正在加速走向濒危,甚至灭亡。美国学者曾做过估算,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世界上50%-90%的语言将在在未来100年间消失(Gorenflo, Suzanne, Russell & Kristen, 2012)。目前人类社会面临如何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全新课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由于对语言的界定不同,学者们对中国语言的具体数目观点各异。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有多达300多种语言(Lewis, Gary & Charles, 2014),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我国的语言数量为130种左右(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如何科学保护国内各种语言的活力,是广大语言研究者者和民族学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国内已有学者(李宇明, 2010;谢俊英, 2011)关注全球化以及城镇化对语言生活及语言活力的影响。鉴于我国幅员辽阔,语言文字环境复杂,要全面了解全球化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发展的影响,需要就不同语言环境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

在国内的这些语言中,藏语文是国际社会较关注的语言,也是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之一;其使用者遍及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因历史发展及地域环境不同,藏语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被分为卫藏、安多、康三种方言。因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其他民族

杂居程度不同,藏语各方言内部的使用情况和语言活力也存在差异。为了解藏语文活力现状,“藏语文使用活力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分别调查了国内藏语三大方言的藏语文活力(本文作者负责调查藏语安多方言的活力)。在安多方言区藏语文活力调查中,在青海省和甘肃省内选择城镇、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等七个藏族社区为调查点,¹考察社区中的语言生活、藏语文和汉语文的活力以及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变体的态度。希望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能够为深入认识语言接触、语言发展以及藏语文保护提供个案,为制定民族政策、语文政策提供第一手借鉴资料。本文由藏语安多方言区的一个农区藏族社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力加村)的调查数据整理而成。

1. 研究概况

1.1 尖扎县力加村简介

力加村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距县城 15 公里。全村约 40 户,300 来人,全部为藏族。农业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全村人均水浇地 0.3 亩,拓荒地 2.5 亩。近些年来为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一些青壮年开始走出农村去其他地方务工,这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手段。

1.2. 抽样以及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很多时候需要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为掌握被调查对象的全貌,理论上来说,穷尽调查所有研究对象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研究成本以及研究的可行性。这时

¹ 藏语文活力研究选取的安多藏语调查点分别如下:第一,青海省尖扎县城马克堂镇(城镇),完成论文《城镇化背景下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马克唐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具体见《语言学研究》,2014年第14辑:181-189;第二,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城镇),完成论文《城市化进程中甘青藏区语言文化生活研究——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为个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153-159;第三,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城镇),完成论文《藏族牧区小城镇的语言文化生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142-147;第四,青海省力加村(农区),完成论文《藏族小山村的和谐语言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力加村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即本文;第五,青海省古什当村(半农半牧区),《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84-90;第六,甘肃省天祝县菊花村(半农半牧区),完成论文《一个藏汉双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天祝藏族自治县菊花村一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具体见《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年第2期:87-98;第七,青海省羊直牧委会(牧区),完成论文《经济大发展背景下藏族牧区的语言文化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羊直牧委会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北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12-16。调查员在这些调查点采用相同的调查方法和调查工具获取数据,研究不同调查点的藏语文活力。后续研究将比较不同调查点藏语文活力的异同,探讨影响语言活力与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

候,科学抽样、以样本推论全体的研究方法,就成为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中的常用办法。

抽样的方式有很多种,“阶段抽样”、“偶遇抽样”、“雪球抽样”、“判断抽样”等都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常用的抽样方法。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借鉴祝晓瑾(1984)研究“师傅”的用法时的抽样方式,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阶段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于2011年7月30日至31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力加村的村口,以随机偶遇的方式,挑选34户作为入户调查对象(抽样率大于40%),并在各户抽取1人为主调查对象(全部为藏族)。主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6至69周岁之间,其基本信息见表1。

表1: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N=34)

指标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男	女	青年 (≤25)	中年 (26-39)	老年 (≥40)	大专及以上	高中(含 中专)	初中	小学	没上过学
人数(人)	19	15	11	10	13	2	7	5	5	15
比例(%)	55.9	44.1	32.4	29.4	38.2	5.9	20.6	14.7	14.7	44.1

1.3 问卷结构及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调查问卷²和访谈大纲收集数据。除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以外,问卷还包括41道选择题,从语言习得、语言掌握、语言学习途径、语言使用、语言文字态度等方面全貌考察被调查对象的语言生活。问卷采用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信息。所谓开放式,是指问卷给出选项,调查员提问后被调查对象根据选项提供答案。所谓开放式是指被调查对象并非局限在给定的选项上选择观点,如果他们认为选项不能表达(或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观点,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这时候,调查员在试卷所留的空白处真实记录这些观点;如果调查员认为被调查对象的观点特别有价值,这时候调查团队会针对这一问题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

² 调查问卷由作者本人,中央民族大学李庐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龙从军、孔敬、马爽共同设计,最后由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行研究员审订。在此对为这项研究付出辛勤工作的老师们表示感谢。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由作者本人和杨忠旦增³于2011年7月完成。田野调查完成后,调查员初步统计调查问卷。如遇到调查信息不清晰、或者信息特别有价值,调查员会依据被调查对象提供的联系方式对其进行电话回访。问卷的各项信息检查无误后,信息被输入到计算机,在统计软件 SPSS15.0 的帮助统计调查对象的语言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力加村语言生活的具体情况如下。

2. 语言习得、语言文字能力及语言使用

统计调查数据后发现,本研究中的被调查对象处于良好的藏语环境中,小时候(上学前或5周岁前)除一位被调查对象外,其他人的父母同他们都只讲藏语,⁴因此被调查对象最先学会了藏语;现在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能流利地听说藏语。相比藏语环境,当地的汉语环境较为一般,仅不足一半的被调查对象(16人)能用汉语交流。会汉语的被调查对象中7人为女性,9人为男性;他们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下;都接受过较好的学校教育。另外,被调查对象中6人能听懂藏语卫藏方言;1人基本能听懂康方言;没有人能用藏语卫藏方言或康方言交流。21名被调查对象能够读写藏文(19人“能读书看报”,2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1人“只能看懂便条或留言条”;15人“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3人“能写家信或简单文章”,3人“只能写便条或家信”),16名被调查对象能读写汉文(11人“能读书看报”,5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8人“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5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3人“只能写便条或家信”)。⁵

调查还发现,被调查对象学习藏语文和汉语文的途径不尽相同:被调查对象通过“家里人影响”(34人次)、“学校学习”(11人次)和“社会交往”(3人次)学会藏语,⁶通过“学校学习”(16人次)、“社会交往”(2人次)、“家里人影响”(2人)、“看电视”(1人次)学会汉语;通过“学校学习”(19人次)和“家里人影响”(9人次)学藏文,通过学校学习(17人次)学会汉文。

自报受家人影响自然学会汉语的两位被调查对象年龄都较小:一位 24

³ 杨忠旦增(男,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2010级研究生。此次调查过程中,杨忠旦增给予了极大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⁴ 调查地主要通行藏语安多方言。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藏语专指藏语安多方言。

⁵ 此处16人自报能读写汉文,但是下题中17人自报通过学习学会汉文,二者矛盾。其原因在于1人曾在学校学习过汉文,由于长期不使用,自认为现在已经不会汉文了。事实上,这位被调查对象能够读懂调查问卷中的部分语句。由此判断,被调查对象中能读写汉文的应该是17人。

⁶ 问卷中部分题目为多选题,因此部分题目中总人次多于总人数,下同。

岁的男性，职业是教师，本科学历；其父也为教师，从小教他汉语。另一位是19岁的女高中生，和家人（主要是同辈）用汉语交流（包括兼用藏语）。

由于当地的语言环境主要是藏语，被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单一。在家庭内部，除个别年纪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调查对象兼用藏汉双语外，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仅使用藏语交谈；在社会公共场合，藏语是被调查对象的第一选择，如果遇到对方不会藏语，会汉语的被调查对象将转用汉语交谈。对所有被调查对象来说，藏语是对他们较重要的语言。

3. 语言文字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其使用的语言形成的某种看法或评价（王远新，1999）。通常来说，由于自身掌握多种语言，双语或多语人的语言态度会比单语人更加敏感与直观。语言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语言发展。一般来说，积极的态度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反之，消极的态度将导致语言逐渐失去活力。但是，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由于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与行为倾向有时也存在矛盾。

3.1 对相关语言文字用处的评价

总体来看，被调查对象对藏汉语言和文字的评价都比较积极，对藏语文的评价稍高于对汉语文的评价。具体来说，28人认为藏语很有用，6人认为藏语仅对一部分人或有一定范围有用；33人认为藏文很有用，1人认为藏文仅对一部分人或有一定范围有用。24人认为汉语很有用，4人认为汉语仅对一部分人或有一定范围有用，6人认为汉语没有用；23人认为汉文很有用，8人认为汉文仅对一部分人或有一定范围有用，3人认为汉文没有用。

当被问到哪种语言或方言对他们更重要时，22人单选藏语，10人兼选藏汉双语，1人兼选藏语和英语，1人同时选择藏语、汉语和英语。兼选英语的两位被调查对象都是女中学生。访谈中一位被调查对象说到，她上的是汉校，现在读高二。要想考上好大学，必须学好英语。英语对她太重要了，所以她兼选了英语。

3.2 对语言文字发展前景的期望

与对相关语言文字的实用功能评价类似，被调查对象对藏汉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前景态度都比较积极，其中对藏语文的前景期待较汉语文更积极。具体来看，31人希望藏语有很大发展，3人希望藏语在一定范围内发展；33人希望藏文有很大发展，1人希望藏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22人希望汉语有很大发展，4人希望汉语在一定地方发展，8人希望汉语自然发展；23人希望汉文有很大发展，5人希望汉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6人希望汉文自然发展。

访谈中，部分被调查对象还谈了对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前景的看法，他们大多希望这些藏语方言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认为这些方言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内有用。

结合被调查对象的语文能力和语文态度分析，二者存在正相关。例如，在会讲汉语的16名被调查对象中，12人认为汉语很有用，4人认为汉语对一部分人有用。会汉语的被调查对象中认为汉语很有用的比例（75%）高于平均值（70.1%）。由此可见语言能力与语言态度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4. 语言文化行为倾向

4.1 日常文化生活

被调查对象中，21人经常收看安多藏语电视节目，11人兼看藏汉双语电视节目，1人仅看汉语电视节目，1人不看电视节目。另有3人自报兼看藏语卫藏方言的节目，他们表示，虽然听不懂藏语卫藏方言，但听起来感觉亲切。

21人常收听安多藏语的广播，8人兼听藏汉双语广播，5人从不听广播。另有4人自报兼听藏语卫藏方言的节目（主要收听歌曲）。

6人自报经常阅读藏文报刊，5人有时阅读，2人偶尔阅读，21人从来不阅读。

1人自报经常上网，5人有时上网，4人偶尔上网，24人从来不上网。在自报上网的被调查对象（包括经常上、有时上、偶尔上）中，8人既上汉文网站又上藏文网站，2人只上藏文网站；上藏文网站的被调查对象偏好同元藏文输入法、班智达藏文输入法和宗卡藏文输入法。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对象的日常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等。其中看电视和听广播是被调查对象最喜欢的文化活动，藏语文节目是被调查对象最常欣赏的节目。

4.2 子女教育倾向

教育是关乎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解被调查对象对教育的看法，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道题“假如您家附近有不同语言教学类型的小学，您希望后代接受哪种语言的教学（可多选）”。

与安多藏区其他农区及城镇的调查结果类似（姚春林，2012；2013；2014a；2014b；2014c），力加村有一半被调查对象（17人）希望后代接受多语教育，其中13人希望后代接受藏汉英三语教育，4人希望后代接受藏汉双语教育。另外17人希望后代接受藏语单语教育。访谈中部分被调查对象表达了他们对藏汉双语或藏汉英多语教育模式的看法。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都希望用藏语

作授课语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加授汉语课，从三年级加授英语课。⁷

5. 藏语文专项调查

5.1 学习藏语文的目的

被调查对象学习藏语文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他们给出的原因主要包括“因为我是藏族人”（30人次）和“弘扬本民族文化”（22人次）。他们认为藏族人就应该掌握藏语，不需要什么理由。此外还有一些人从实用角度考虑学习藏语，这些理由包括“学好藏语有前途”（8人次），“说藏语能与更多的人沟通”（5人次），“工作或外出需要”（1人次）等。

5.2 认为藏语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语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时，被调查对象给出的答案较为多样。6人认为藏语在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调查对象主要担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和周围的语言环境。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文发展的原因包括“政府制订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23人次），“周围说藏语的人变少、说的机会变少”（8人次），“说汉语更有个人发展前途”（5人次），“说汉语可与更多人沟通”（4人次）等。

5.3 认为藏文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文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时，被调查对象给出的答案同样较为多样。6人认为藏文在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调查对象主要担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和当地藏族人对于汉语教育的偏爱。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文发展的原因包括“政府制订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22人次），“更多的学生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授课学校上学”（14人次），“藏文出版物较少”（11人次），“藏汉双语教学质量不高”（8人次），“藏文信息化程度不高”（3人次）等。

以上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学习藏语的主要目的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本民族文化”）；他们认为可能影响藏语文在当地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行不到位”。访谈中有多位被调查对象都表达了如下类似的观点：我们国家有较为完善的民族语文保护法律法规。依据法律，各民族都有平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力，但实际操作中却

⁷ 不同地区的藏族群众对藏汉双语教育的模式持不同观点。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调查时，几乎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表示，他们理想的藏汉双语教学模式是采用汉语作为教学语言，从一年级起加授一门藏语课。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公务员招聘考试中,汉语占相当比重。如果考生仅会民族语不会汉语,不可能被录用;反之,如果仅会汉语不会民族语,不影响最终的录取。这客观上鼓励学生学习汉语,忽视本民族语。久而久之,当地的藏语文会遇到危机。他们很多人认为,国家的语文政策有利于保护民族语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些具体措施或要求与国家的政策法律不是特别符合,这不利于保护藏语文。由此可知,切实落实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语文政策,是发展和保护藏语文的有效手段。

6. 力加村藏语活力现状

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语言活力应该包括的内容以及如何客观测量语言活力。曾先后出现了菲什曼(Fishman, 1991)的语言复兴及语言活力八阶段理论;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的语言活力标准(Grimes, 2000; Gordon, 2005; Lewis, 200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语言活力与语言多样性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 2003);列文森和西蒙斯(Lewis & Simons, 2010)的扩展的语言复兴及语言活力十三阶段理论。

在这些语言活力标准中,“扩展的语言复兴及语言活力十三阶段理论”是在其他理论基础上新发展而来的。是当下学界较公认的语言活力与濒危分类标准。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2014年出版的《民族语:世界的语言,第17版》(*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eventeenth Edition*)就是以此标准划分世界语言活力的(Lewis, Simons & Charles, 2014)。这一标准将语言分为十三个等级,按照活力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 language)、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地域语言(Regional language)、商业语言(Trade language)、教育语言(Educational language)、书面语言(Written language)、有活力的语言(Vigorous language)、受威胁的语言(Threatened language)、转换中的语言(Shifting language)、垂死的语言(Moribund language)、几乎灭绝的语言(Nearly Extinct language)、休眠的语言(Dormant language)、灭绝的语言(Extinct language)。其中“国际语言”是指该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国家语言”指在全国范围内该种语言被应用于教育、日常工作、大众媒体、政府服务等各领域;“地域语言”指在地方或区域范围内,该种语言被应用于大众媒体或政府服务领域;“商业语言”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该种语言被区域内的人应用于日常工作领域;“教育语言”指该种语言仍然应用于教育领域,语言能力能在教育领域得到传承;“书面语言”指该种语言的口语形式被社区内所有代际的语言使用者使用,并且能够有效使用这种语言的书面语形式;“有活力的语言”指该种语言的口语形式被所有代际的语言使用者使用,儿童仍将这种语言作为第一语言习得;“受威胁的语言”指该种语言的口语形式被所有代际的语言使用者使用,但仅有部分年轻母亲希望把这种语言传授给下一代;“转换中的语言”指

这种语能够被父母辈的人用来与长辈流利交流,但不愿将这种语言传承给下一代;“垂死的语言”指仅祖父辈健在的人能够说这种语言;“几乎灭绝的语言”指仅祖父辈的人或特别年长的人能够说这种语言,但他们却很少有说这种语言的机会;“休眠的语言”指该种语言仅作为一个族群的身份象征,除此功能外,没有人使用它;“灭绝的语言”指没有人把这种语言与族群身份联系起来,甚至不将其作为身份象征。

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在力加这个藏族小山村,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能流利地用听说藏语,61.8%的被调查对象能够读写藏文;藏语文被应用在当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按照“语言复兴及语言活力十三阶段理论”衡量,调查地的藏语文活力处于“地域语言”级,属于活力比较旺盛的语言。

接下来历时比较安多藏语方言区农村社区的语言活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语言学者曾在青海省共和县甲乙村调查过41名藏族的语言文字能力。结果显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甲乙村的41名被调查对象全部都懂藏语;4人(9.8%)懂汉语,15人(36.6%)略懂汉语,22人(48.8%)完全不懂汉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1994:292)。力加村与甲乙村相聚200公里,同为以农业为主的藏族社区,两地语言文化环境极为相似。比较前后三十多年藏族农村社区的语言环境发现,藏语的活力仍然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仍旧是当地最主要的交际语言;汉语文的活力得到提升,三十年前仅9.8%的人完全懂汉语,而现在有47.1%的被调查对象不仅能够使用汉语流利交流,还能够读写汉文。

7. 结语

在力加这个藏族小山村,藏语文充满活力,其活力与三十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现在等级位列“语言复兴及语言活力十三阶段理论”的第三级(“地域语言”级),仍旧是当地主要的交际工具。半数被调查对象兼通藏汉双语。通常情况下,汉语是藏语文交际功能的补充。当会汉语的被调查对象遇到不会汉语的交际对象时,被调查对象转用汉语交谈,此时汉语代替藏语成为人们的交际工具。

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文字态度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对藏汉语文的态度都比较积极,其中对藏语文的态度更积极。几乎所有被调查对象都认为藏语文很有用,希望其有很大发展;7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汉语文很有用,希望其有很大发展。所有被调查对象都希望后代接受藏语教育;近一半被调查对象希望后代在接受藏语教育的同时接受汉语和(或)英语教育,成为多语人。

调查结果还显示,被调查对象学习藏语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本民族文化”)。虽然藏语文是调查地主要交际工具,仍有一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担心“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行不到位”会影响当地的藏语文发展。

“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行不到位”会影响当地的藏语文发展，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一些年龄较大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调查对象。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双语教育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自己不会藏语的忧虑。访谈中一位被调查对象（女，65岁，没上过学，农民）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年轻人都爱说汉话，我不会汉话，只会藏话。藏人为啥讲汉话呢？可能他们外出打工时需要吧。我这大年纪了，学汉话没用了。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多说些藏话，毕竟是藏族吗，怎能忘记老祖宗的话呢？”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这位被调查对象也知道汉语对外出工作的重要性，她担心的是学习和使用汉语会影响当地藏语的活力。事实上当地藏语活力旺盛，目前应该大力发展的是藏汉双语教育，在保持藏语文活力的前提下逐渐提高当地人的汉语文水平，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藏汉双语人。这样既保护藏语文活力，又能使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全球化、城镇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民族地区既要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又要发展民族经济，双语化（或多语化）是重要选择。目前力加村正在通向双语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藏语文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另一方面汉语文正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逐渐推广。照此发展下去，相信力加村这个藏语社区一定会发展为藏汉双语社区。这既有利于发展当地的经济，又有利于保护藏语文的活力。

本文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一个藏语小山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但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受时间和精力所限，采用“偶遇抽样”而非“阶段抽样”的方式选取受试、受试数量较少，等等。这使本研究的结论仅能部分反映调查地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状况。要全面了解民族地区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还需要增加更多的研究个案，甚至进行长时间跟踪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 李宇明，2010，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代序）[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上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1-5。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2003，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R]。布鲁塞尔：新欧洲的语言多样性研究大会。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7，中国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远新，1999，论裕固族的语言态度[J]。语言与翻译（2）：9-14。
- 谢俊英，2011，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语言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39-43。

- 144 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农村社区的语言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力加村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 The Language Life in a Tibetan Village Community with Globalization: Case Study on Language Use and Attitude in Lijia Village, Huangnan, Qinhai

姚春林, 2014a, 藏族牧区小城镇的语言文化生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1): 142-147。

姚春林, 2014b, 城镇化背景下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马克唐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J]。语言学研究(14辑): 181-189。

姚春林, 2014c, 经济大发展背景下藏族牧区的语言文化生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羊直牧委会藏语文使用及态度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2): 12-16。

姚春林, 2012, 一个藏汉双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天祝藏族自治县菊花村一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J]。中国社会语言学(2): 87-98。

姚春林, 2013, 城市化进程中甘青藏区语言文化生活研究——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为个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 153-159。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M]。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祝畹瑾, 1984, “师傅”用法调查[J]。语文研究(1): 44-47。

Fishman, J.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Gordon, R. G. (ed.), 2005.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5th Edition*.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Gorenflo, L. J., R. Suzanne, A. M. Russell & W. Kristen, 2012. Co-occurrence of linguistic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biodiversity hotspots and high biodiversity wilderness are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21: 8032-8037.

Grimes, B. F. (ed.), 2000.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4th Edition*.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Lewis, M. P. (ed.), 2009.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xteenth edition*.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 F. S. Gary and D. F. Charles (ed.), 2014.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eventeenth Edition*.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 & F. Gary, 2010. Assessing Endangerment: Expanding Fishman's GIDS. *Revue Roumaine de Linguistique* 55, 2: 103-120.